

21世纪中美关系的宏观透视

贾烈英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基础教学部,北京 100083)

[摘要] 中美关系是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近些年来,双方关系一直起伏不断,时好时坏。到底影响中美关系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21世纪,双方关系的前景怎样? 本文通过分析中美在当今世界的战略地位,美国的对华战略意图及不同政策主张,中国的对美政策,提出了制约中美关系的实质性因素,这将有助于我们了解未来双方关系的演变。

[关键词] 中美关系; 美国对华政策及主张; 制约因素

[中图分类号] D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08X(2001)01-0084-05

中美关系是中国外交中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可是自从冷战结束后,中美关系日益复杂化,每一年双方关系的进展都是一波三折,扑朔迷离。到底哪些因素在制约中美关系的演变,未来中美关系的前景怎么样? 本文拟从双方的国际地位、美国的对华战略、中国的外交选择等方面,提出笔者对中美关系的管窥之见。

一、全球性大国与地位日渐上升的地区性大国

从 90年代国际关系的现状,我们不难看出,美国已成为当今唯一的一个超级大国。它利用国内国外所处的大好时机,加大了对国际事务的干预力度,使国际秩序朝自己设计的方向演变。克林顿政府更将美国外交的霸权面目暴露无遗。对于美国当今的国际地位,大家争议不多,不同的是它这种地位是否已达极限,还将延续多久。

对于中国,国力日增也是不争的事实,港澳的顺利回归和国企改革的初见成效便是佐

证。苏联的解体对于中国的战略地位提出了挑战,这一挑战从多方面体现出来,如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大国关系、周边环境,甚至本属中国内政的人权、台湾等问题。这些在过去的 1999年都得到了充分的表露。中国民间再次出现了“说不”的民族主义思潮^①。

应当承认,目前中国所处的内外环境不容乐观。但也不必渲染国难临头,中美之间难免一战。更有些学者主张准备打大仗,诱敌深入,经过战争打出一个新的社会主义东亚阵营。科索沃战争既是北约新战略的尝试,也是高科技条件下的以强凌弱的战例。但这场战争没有什么普遍意义。它不能改变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主题的论断。中国驻南使馆被炸事件不能改变中国改革开放的既定日程,它只能使我们更清醒,卧薪尝胆,争取在本世纪中叶成为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目前世界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大趋势,中国只能更深的融入世界,增加开放程度,除此别无良策。

有了这样的定位,我们在处理中美关系时,就能避免盲目崇拜与狂热排外的两种倾向。

[收稿日期] 2000-10-16

[作者简介] 贾烈英,男,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社科院副教授。

① 可参阅《碰撞:全球化陷阱与中国现实选择》,韩德强著;《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房宁、王小东著。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二、如何看待美国对华政策的战略意图

由于中美两国意识形态、价值观差距甚大,所以美国历届政府都以演化中国为已任。这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政治民主化、思想自由化、政党多元化、经济市场化、民族自决化。在五个方面中,政治民主化最关键的是直选(尤其是最高领导人、中国村、乡镇领导的直选,西方国家特别重视);政党多元化中最主要的是多党制,八国首脑会议中,俄罗斯国民生产总值不到中国的一半,但俄罗斯加入了西方俱乐部。西方的解释是:“中国不是民主国家,中国没有完全实现市场经济,中国国家首脑不是直选产生的”。美国加强在意识形态上与中国对抗,主要由于以下几点:

(1)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所以西方把中国看成是共产主义的最后堡垒,“和平演变”的首选目标。

(2)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增大,西方国家“和平演变”决心更大,心情更加迫切。

(3)即使中国变成了资本主义制度,西方也不能容忍中国的崛起。在强化意识形态的对抗的同时,从经济外交各方面制约中国。经济上,人为地制造一些困难,阻碍和推迟中国现代化进程。如提出一些我不能接受的条件阻碍中国加入 WTO;阻碍其他国家向中国出口高科技产品。

军事上,一个是保持在亚太地区 10 万人的军事力量,另一个是利用在亚洲的军事同盟关系(在亚洲有五个双边同盟关系:日、韩、泰、菲、澳),在军事上制约中国,扩大与日本军事上的合作,主要目的是为了对付中国。

在中国统一问题上,搞分化。美国认为,使一个国家处于分裂状态是制约一个国家的最有效的王牌。在台湾、新疆、香港问题上,美无孔不入地进行分裂活动,接见李柱铭、达赖,允许李登辉访美。

外交上,鼓吹“中国威胁论”,这是美国人和日本人制造和散布出来的,已损害中国形象,破坏中国与亚太国家的关系,减少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

但美国也记得利用中国的有价值之处,如利用中国的广大市场,为美国自身政治经济服务;在联合国做中国的工作,为美国在联合国推行其外交政策创造有利条件;利用中国在地地区热点问题和全球性问题(人口爆炸、生态平衡、军控、恐怖主义、国际走私贩毒、资源等六大问题)上的重大影响,附从于美国的对外战略意义。美国认为这些问题上没有中国的支持,无法顺利实现自己的目标。以上美国的战略意图决定了中美关系的两重性。

中美关系的两重性,表现在利益、政策策略和态势三个方面。

(1)利益上的两面性,美国对中国而言具有广阔的市场、先进的科技和管理方法。美日军事关系、美对日的核保护伞使日本不能发展核武器,应该说对中国有利。另一方面,美国是对中国西化分化的主要力量,安全的主要威胁。中国主张朝鲜半岛无核区,美也反对朝鲜发展核武器,美国认为与中国的观点相吻合。

(2)政策策略上的两手。利益的两重性决定了我们要有两手,既要利用美国又要防范美国,既合作,又斗争。美国既要利用中国,也要演化制约中国,手法上既接触又遏制。有共同利益的问题上,进行协调合作,有不同利益就要矛盾斗争。

(3)态势上的两种状态的并存,进展与挫折并存,起伏不定。上半年差一些,下半年好一些。因此,我们在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取得进展时,不要估计过高,出现暂时挫折时不能心灰意冷。到 21 世纪的 2015 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最保守估计要居第三位,好的估计是超过美国。这样,将有一个如何相处的问题。克林顿 1993 年说“强大稳定繁荣的中国对美国有利”。但相当一部分美国人不希望中国的强大。

繁荣崛起 中国的强大是不可阻挡的,只能采取延缓措施 中国也的确需要美国。1993年8月江泽民在接见《朝日新闻》记者时指出:增加信任,互相协作,不搞对抗。现在美国两党已形成共识:中国对美国越来越重要。不出现大的意外的话,中美关系不会出现大倒退。但也不会风平浪静

三、美国对华政策的不同主张

在美国国内,由于政治倾向、集团利益和见识不同,在对华政策上有不同的声音。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种:

(1)“中国威胁论”。其根据是中国在意识形态上是美国的敌对国家;综合国力提高,富国必强兵,强兵必用兵。中国2010年国民生产总值将超过美国,中国会情不自禁地把经济实力变为政治实力;中国与无赖国家为伍,美国看谁不顺眼,中国就跟谁好,尤其是伊朗等国家。

基辛格博士对此种说法进行了批驳。在《中国不会构成威胁》一文中,基辛格撰文认为“美国应避免把中国作为命运之敌,我们应该正确看待中国的挑战。的确,中国的经济增长令人瞩目。然而,根据各种各样的推算,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仅相当于我们的10%至25%,尚处于较低水平。因此,如果从精确的数字角度来说,即使中国始终保持10%的增长率,在能够预见到的未来,也仅相当于美国实际增长率的2%至3%的水平。在军事方面,中国并非势力遍及亚洲的军事巨人。我们把国民生产总值的3%~5%投入了国防。中国虽然没有公布准确的军费开支,但几乎所有的专家都认为,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2%。换言之,中国的军费最多只相当于我们的1/10。”^[1]

正如中国著名学者资中筠指出的:“在中美双边关系中已经可以看到的一个新情况是:过去,美国支持中国改革和现代化顾虑较少,如果有,其出发点也是冷战遗留下来的意识形

态因素居多,中国的经济发展形成不了与美国的竞争对手。而现在,尽管事实上中国仍然远非美国的竞争对手,但是美国对中国的发展顾虑多起来,这也是中国威胁论的依据之一。美国现在不担心中国改革倒退,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却害怕中国实力强大。”^[2]

(2)中国是潜在的敌手。中国是敌手,还是潜在的对手?能否从潜在敌手变为现实的对手取决于两条,一是今后10年中国在多大程度上将经济实力变为军事实力;二是今后10年中国究竟对美国采取什么样的政策。

(3)非敌非友。这是美国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斯坦丁·罗尔斯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现在不是敌人也不是朋友;将来可能成为敌人,可能成为朋友;是敌是友不仅取决于中国,而且取决于美国;美国要防止中国成为敌人,要千方百计促使中国成为朋友。

(4)伙伴关系。前美国总统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持这种观点。正如宋以敏研究员所分析的,“布热津斯基认为,中国到2020年会成为地区主导大国,在亚太地区拥有一个势力范围或受别国敬服的范围,而不可能成为在各个主要领域都富于竞争力的全球性大国,尽管中国可能有此抱负。他反对过高估计中国的竞争力和据此得出美国应该采取遏制中国政策的结论。他认为,对美国的中长期欧亚地缘战略来说,同中国建立起合作伙伴关系是不可或缺的条件。”^[3]

这也是美国政府所标榜的立场。实际上美国实行的是遏制加接触战略。他们认为将中国融入国际社会是对付中国最有效的途径。可用全球的或地区性的多边的力量对付中国;用国际条约、国际协议规范中国人的行动,多数章程是美国支持下制订的,用游戏规则约束中国的国际行为,使中国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积极”的成员。如何对付中国的崛起是美国外交面临的最大挑战。

基辛格博士也提出警告,“与中国对抗的政策将使美国在亚洲有遭到孤立之虞。没有一

个亚洲国家希望或承担得起,在美国与中国爆发政治冲突时,出面支持美国;他们认为这是美国政策方向错误,才会爆发美、中冲突。一旦发生这种情况,绝大多数的亚洲国家即使内心可能不愿,多少都会与美国保持距离。几乎每个国家都盼望美国创造一个稳定、长期的架构,能把中国和日本都包容进去——这项方案一旦中美对抗,就绝对不会成功”,“中美关系的关键是默默的在全球(尤其是在亚洲)的战略合作。”^[4]

四、中美关系之间几个热点问题

(1) 贸易冲突,尤其是逆差问题。这个问题既存在计算方法的不同,也存在美方的问题,即我们想买的东西,美方不卖,所以合同被人家拿走了。还有朱镕基总理指出的中方顺差不顺收的问题,因为我们有很多出口的东西,关键零部件是进口的。中美这方面的问题将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找到合适的解决办法。

(2) 人权问题。中国“文革”时人权问题比现在严重多了,那时美国要利用中国反对苏联,搞了中美战略联盟。它没有同中国谈人权问题,只谈苏联人权问题。现在苏联解体了,美又把矛头对准中国了。却闭口不谈一些亲美国国家的人权问题。近几年来,美国国务院以《年度人权报告》为龙头,用人权战略破坏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到 1999 年已经搞了中国 9 次,名堂很多,如《刑法》中的“反革命罪”“危害国家安全罪”说是粗暴;计划生育问题;严打问题(打击目标集中是持不同政见者,侵犯公民权利,不按法律程序办事等等)。

(3) 防止核扩散问题。防止核扩散问题,双方有合作也有不协调之处,美国在这个问题上也使用了双重标准,因人而异。如自己拒绝签署《核不扩散条约》,在朝鲜的核检查问题上却非常积极;对南非、以色列的核武器问题视而

不见。美国的“南亚无核区”,中国是坚决支持的,中国对 1998 年印巴核实验都进行了谴责。

(4) 台湾问题。这是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是一个“定时炸弹”。现在看来,中美建交联合声明留下的漏洞太大了,“联合声明”中有“美对台湾的安全承担有义务”的字眼。

美国以“与台湾关系法”为依据,发展与台湾的实质性关系,阻挠中国和平统一进程。美国不愿意看到海峡两岸实现统一,绝不放弃把台湾作为遏制中国的一张王牌;美国也不会因为发展对台关系而葬送中美关系全局,对华关系与对台关系有主有次,对台关系从属于中美关系的演变。美国不会轻易下和中国进行直接军事对抗的决心。

如果有朝一日我们被迫用非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美国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呢? 美国国防部请思想库作了研究,有四种方式:不作大的反应;外交上谴责,经济上制裁;向台湾当局提供军事情报,大量向台湾输出先进的武器装备,美国人出枪出钱,中国人对付中国人;美国直接介入军事冲突。第一种不可能,第四种不能排除,但可能性不大。二、三种是最可能的选择:外交上谴责,经济上制裁,军事上支持。

不过美国也明确地向台打招呼:不能搞“台独”,搞“两个中国”。大陆不想改变现状,美也不想改变现状。想改变现状的是台湾当局。台湾当局往往在国际社会中制造某种局面,然后把美拉进去,支持台湾当局,然后挑拨破坏中美关系的发展。与此同时,美国在军事上支持台湾增强能力方面,采取了更多的步骤,如出售先进的武器装备;把美日军事同盟条约适应范围扩大到台湾海峡;美想把台湾拉入美国企图建立的战区导弹防御体系。上述三方面的情况结合起来体现出来的一个基本思想是:维持现状,不独不统,即防止我国用非和平的手段解决台湾问题,又约束台湾搞“两个中国”,美国人认为不统不独最符合美国利益。

五、中国的对美政策

中国对外政策的总目标就是争取世界和平,在争取世界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改革开放以后,国际形势不断变化,特别是冷战后初期,中国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国际环境。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5]

中国对外政策的经济目标是对外开放,加强经济交往。邓小平还指出:“对内经济搞活,对外经济开放,这不是短期的政策,是个长期的政策,最少五十年到七十年不会变”,“即使是变,也只能变得更加开放。”^[6]

有了以上根本的判断,我们对美国的政策必然是接触是第一位的,当然也不排除必要的斗争,但分寸是斗而不破,要恰到好处。如果为了图一时痛快,采取了过激的行为将不符合我

们国家的根本利益。为此,我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中美关系:

1. 应加强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与美国国会之间的联系,我们过去对美国国会重视得不够,以为白宫能决定一切,实际情况不是这样。

2. 加强与美国媒体之间的交流,改变其对中国的敌意;因为绝大多数美国人没有来过中国,所以他们对中国的印象主要来自于媒体的宣传,我们自己也要加强对外宣传工作。

3. 继续发展对美国的经济外交与民间外交,以此促进双方官方关系的改善。

4. 探讨双方在国际组织中的合作新形式。例如在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当中,双方都是举足轻重的国家,应该加强协调,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相应的贡献。

在这个过程中,独立自主是我们对美外交的立足点。我想有邓小平的国际战略作指导,有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丰富的外交经验,有中国日益提高的国际地位,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美关系的前途一定是光明的。

[参考文献]

- [1] 《参考消息》1997年8月27日第1版
- [2] 《美国研究》1999年第一期第11~12页
- [3] 《大棋局》布热津斯基,第2页,新华出版社
- [4] 《大外交》基辛格,第769~770页,海南出版社
- [5]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44页
- [6]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79页